

清代伊犁厄鲁特营建制沿革考

哈萨克拜·布音巴图*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西北地区防务,建立起了完备的防务体系。伊犁厄鲁特营作为新疆驻防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厄鲁特营的组建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止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伊犁厄鲁特营创建牛录、编设昂吉、最后分设左右翼昂吉、建立八旗制度,并在此过程中三次更换关防图记,才逐步发展成形。

[关键词] 清代 伊犁 厄鲁特营 满文档案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23)03-0072-06

清朝统一新疆后,清廷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并先后设置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索伦营、锡伯营,逐步在新疆建立起了防务体系。有关伊犁厄鲁特营已有学者研究,^①但对于厄鲁特营建制时间尚未确定。近年来,随着满文档案的公布,就该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讨论的条件。本文利用满文档案,进一步探讨清代伊犁厄鲁特营的建制沿革。

一、创立伊犁厄鲁特牛录方案

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初,清廷对其部众采取剿灭或发往内地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策逐渐调整为招抚和安插。

“谕军机大臣等,安泰奏称,自哈萨克来投之厄鲁特多罗克等十八名口,派员送京等语。

准噶尔全部荡平,哈萨克布鲁特等,俱经归附,从前逃往伊等部落之厄鲁特等,苦其役使,必

* [作者简介] 哈萨克拜·布音巴图(1978—),男(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2020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域民族文献及古典文学研究。

① 吐娜:《伊犁厄鲁特营的戍边》,《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厄鲁特营对伊犁地区的经济开发》,《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清代伊犁将军直辖的两蒙古营制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有陆续来投者,或情节实有可疑,及原系台吉宰桑等,尚可酌量送京,若本无关系之人,而每次劳费驿站,甚属无谓,著传谕驻扎伊犁、乌鲁木齐大臣等,嗣后本非台吉宰桑及带有家口,而情节实无可疑者,即随便酌量安插,或令其牧放马匹,供备差遣,俱可得力,不必概行送京。”^①

据此可知,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对厄鲁特部众招抚安插政策更为明显。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十三日,乾隆帝命伊犁参赞大臣阿桂执行此政策。

“厄鲁特等不堪哈萨克扰害,想必陆续来投者较多,与其将伊等送来,不如留于伊犁等处,牧放牲畜差用,尚属裨益。其良善者施恩,恶者即行惩处,并严加管束之,其能逃往何处耶。”^②

于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一月二十日,伊犁参赞大臣阿桂上奏如何安置收留在伊犁的厄鲁特的详细方案。将此满文档案翻译如下:

“又查得,现在此处所有旧厄鲁特兵,以及新来厄鲁特内,其有劳绩者,俱照绿营兵之例,每月食以钱粮,而其他新来厄鲁特,则止给口米。嗣后陆续归附厄鲁特增多,若均给食钱粮米,每年花费甚巨,止令种地又不符厄鲁特等习性。现奴才等既另折奏请赏给孳生牛羊,若奉旨准行,其旧厄鲁特等内原先食钱粮者,仍给食钱粮;新厄鲁特等内若有另行效力贤能者,则奴才等具奏乞恩,食给钱粮,作为鼓励伊等之途外。其余厄鲁特等,仅得给籽种,令之耕种自食粮石,均停食钱粮。至孳生牛羊,从中酌情责成孳生,自每岁孳生牛犊羊羔内定额交公,作为兵丁口食备用外,其本羊不动,并将额外孳生者,均拟赏给厄鲁特等作为恒产,如此则现有孳生羊只,即犹如其产业,衣食全行可得,且符合伊等习性,亦可不起意他往。若蒙皇上允准奴才等所请行,则将现在伊犁所有厄鲁特等内,其旧厄鲁特兵所委骁骑校楚楚木,即补授正骁骑校,暂令管束,其后陆续添增,厄鲁特男丁数至百名,补授佐领之处,另行请旨具奏。奴才等为长久安置厄鲁特等起见,尽陈愚忱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睿鉴。”^③

此一方案,遂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奉旨准行。

据上述满文档案可知,阿桂提出的创立厄鲁特牛录之方案很快得到清廷允准。其方案内容涉及屯田、孳生牲畜、官员拣选、钱粮、社会组织等各方面。此方案为那些四处流散、疲于奔命的厄鲁特部众创造了生机,对清廷而言,该实施方案也为西北边陲铸就了一支驻防后勤的保障队伍。

二、编设伊犁厄鲁特牛录

乾隆帝允准在伊犁编设厄鲁特牛录后,伊犁参赞大臣阿桂等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七月初三

① 《清高宗实录》卷619,中华书局,1986年,第960-961页。

②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将来归之厄鲁特人数足百可编一牛录折》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59页。

③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将来归之厄鲁特人数足百可编一牛录折》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61页。

日奏：

“查得，现在此地所有厄鲁特，由肃州、阿克苏所派送厄鲁特及陆续由哈萨克、布鲁特来投厄鲁特，大小男女总共有五百余名，其中男丁有二百六十七名，先编设二牛录，头等牛录由头等侍卫卓哩克图巴图鲁硕通作为佐领管带，骁骑校由已任骁骑校厄鲁特楚楚木补授，二牛录由京城派驻伊犁之厄鲁特三等待侍卫硕通补授佐领管带，骁骑校之缺，由先前跟随将军大臣勤勉行走者厄鲁特兵散讷木库补授，领催由奴隶处为人堪以人员内拣选补放，除了被编设二牛录男丁外，尚剩六十七名男丁，虽不足编设一牛录，则不可无人管带，跟随将军大臣勤勉行走者厄鲁特兵乌勒哲依博勒呼补授领催补放，奴隶之兵丁数目到达编设牛录数目时，补授佐领之事，除了另行请旨补放外，遵旨巴图鲁侍卫硕通补授翼长总管办事。”^①

乾隆帝朱批曰：“允准所奏准行。”^②据此可知，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八月，二百名厄鲁特男丁为一个牛录，编设二牛录并补放翼长、佐领、骁骑校等官员，而官员务必从早已归附的在京城或察哈尔兼管厄鲁特人中拣选。

据满文档案《参赞大臣阿桂等奏将伊犁厄鲁特等编设旗佐折》有如下记载：

“由布鲁特、哈萨克来投厄鲁特男女已达到四百多人口，其中男丁二百七十名，包括先前编设牛录所剩六十七名男丁，共三百三十七名男丁，理应编设三个牛录，补授这三牛录佐领适合人员，查得，现有厄鲁特三等待侍卫硕通，厄鲁特蓝翎都布珠尔二人内，虽都布珠尔够格，且三牛录补授佐领不够，尚有陆续来投厄鲁特，编设牛录时又求旨缺员，请圣主降旨，在京城、察哈尔之厄鲁特侍卫内萨木腾、库库济克、达什等人员内拣选几员，乘便换班兵一同派驻伊犁，补授佐领管带厄鲁特，为此谨奏请旨，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③

伊犁参赞大臣阿桂该折随后被奉旨准行，由此可知，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二月，伊犁厄鲁特男丁达到三百三十七名，经清廷允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已编设五牛录并补放官员，请求出缺之官员从京城或在察哈尔兼管厄鲁特内拣选派遣。

据满文档案《参赞大臣阿桂等奏伊犁新编厄鲁特牛录补放佐领骁骑校等员缺折》有如下记载：

“查得，现陆续来投厄鲁特，共有男丁六百余名，除去从前补授佐领之巴图鲁头等侍卫硕通、三等待侍卫硕通等所管头、二牛录，尚应编设四个牛录，其三牛录拟以库库济克为佐领；四牛录拟以达什为佐领；五牛录拟以都布珠尔为佐领，令其兼管外，尚有六牛录佐领一缺。经查，厄鲁特正骁骑校楚楚木、乌勒哲依博勒呼，均系旧厄鲁特，自伊等补放骁骑校以来，各自管束厄鲁特，为派差及伊等生计起见，颇为留心效力，尚属堪以办事。是以，六牛录佐领一缺，以楚楚木拟正，乌勒哲依博勒呼拟陪，请旨具奏，仰祈皇上指定一员。”^④

据上引满文档案可知，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四月，伊犁厄鲁特男丁人数已经达到六百余名，编

①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伊犁厄鲁特编设牛录并选任佐领等员折》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5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②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伊犁厄鲁特编设牛录并选任佐领等员折》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5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③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将伊犁厄鲁特等编设旗佐折》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5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④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伊犁新编厄鲁特牛录补放佐领骁骑校等员缺折》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5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设六牛录并补放佐领、骁骑校等官员。

三、编设伊犁厄鲁特昂吉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初,因伊犁驻防之需求,将当地厄鲁特人编为6个牛录,分设佐领、骁骑校等员管带,承应各项差使。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初,清廷决定再增派1000名察哈尔携眷兵丁永久移驻伊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三月,伊犁将军明瑞为了提前做好筹办方案奏称:

“将先后携眷移驻之一千八百名察哈尔兵编设二昂吉,每昂吉为九百名兵,厄鲁特之一千名兵编设一昂吉。察哈尔、厄鲁特兵共为三昂吉,每昂吉各设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佐领六员、骁骑校六员管束,每牛录各设领催四名。……现察哈尔、厄鲁特等皆编设昂吉、设置总管、副总管、佐领,所有呈报、支取钱粮等事宜,均由伊等承办,若无图记,则天长日久后难免滋生弊端。察哈尔在原游牧之总管、佐领等,均有颁发给关防、印记之例。故请酌情赏给伊犁现设察哈尔、厄鲁特总管、佐领等图记,用于呈报、支取钱粮事宜,则凡事有凭,便于查办,伊等办事亦可得力。察哈尔、厄鲁特人众又视伊等为掌印管事之员,尊崇意从,益加恭敬。”^①

遂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奉旨准行。于是,“乾清门巴图鲁侍卫硕通授为厄鲁特昂吉总管,库库济克授为副总管。”^②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月,颁发了伊犁厄鲁特营总管、副总管、佐领关防印记。满文档案记载如下:

“钦赏本地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四昂吉总管关防四枚、佐领图记二十四枚,经军机处具奏,乘奴才等所遣贡马空蓝翎贝保返回之便交给带来,于四月二十日抵达伊犁。于是,传来索伦昂吉、左翼察哈尔昂吉、厄鲁特昂吉总管、副总管、佐领等,望阙叩谢天恩,颁发其关防、图记。”^③

据此,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月清廷给伊犁厄鲁特总管、副总管、佐领颁发了关防图记。这标志着伊犁厄鲁特营正式设置。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自编设伊犁厄鲁特牛录至设置伊犁厄鲁特昂吉已有四年,其社会组织、昂吉职能、职官、经济生产方式、官兵俸禄、游牧地等基本以上得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其二,将移驻伊犁之察哈尔与当地厄鲁特兵丁合理统筹办理,承应差使,孳生牲畜,有效管理,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差别和混淆。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在伊犁由当地厄鲁特人组建的厄鲁特昂吉、察哈尔二昂吉后,仍未彻底解决当地的防务问题,仍需移驻更多的八旗兵丁前往。清廷决定从承德达什达瓦兵内拣选500名携眷兵丁移驻伊犁。时任伊犁将军的明瑞就编设达什达瓦兵丁一事奏称:

“皇上若允准奴才等所奏,现在编设昂吉之总管、佐领等员,亦应照此处厄鲁特昂吉之例,铸给关防印信,而关防印文,定为达什达瓦昂吉,稍有不妥。筹其从前归附,拟将伊等编

^① 《伊犁将军明瑞等议奏续迁察哈尔兵丁筹办安置事宜折》,吴元丰、胡兆斌、阿拉腾奥其尔、刘怀龙主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②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代厄鲁特营硕通等谢补放总管之恩折》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6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1页。

^③ 《伊犁将军明瑞等给厄鲁特索伦察哈尔等营总管关防佐领图记折》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6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7页。

为左翼厄鲁特昂吉,此处旧厄鲁特昂吉编为右翼昂吉,如此定准,则旧厄鲁特昂吉之总管、佐领等,现持关防印信所刻印文,均不合宜。颁给左右两昂吉之总管、佐领等关防镌刻印文,另缮清单,一并呈览。容铸造新关防送来,再将旧昂吉之总管、佐领等旧关防,乘便送部销毁。”^①最后印文的文字如下,其左翼厄鲁特总管、佐领关防图记的文字如下:

“管理驻防伊犁左翼厄鲁特昂吉总管关防;左翼厄鲁特昂吉一牛录佐领印信,二、三、四、五、六牛录,均照此铸造。”

其右翼厄鲁特昂吉总管、佐领关防图记的文字如下:

“管理驻防伊犁右翼厄鲁特昂吉总管关防;右翼厄鲁特昂吉一牛录佐领印信,二、三、四、五、六牛录,均照此铸造。”^②

由此可见,本可以按照厄鲁特昂吉之例,铸给关防图记,然而,为了回避“达什达瓦”一名称,重新更换了其名称及关防图记。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由热河达什达瓦厄鲁特兵丁内拣选500名年富力强者移驻伊犁;其二,移驻伊犁的达什达瓦兵丁亦应照伊犁厄鲁特昂吉之例,铸给关防图记,而关防印文,定为达什达瓦昂吉不妥,故编设为左翼厄鲁特昂吉。显然,达什达瓦是准噶尔贵族台吉,故意回避“达什达瓦”一词而更换其昂吉名称及关防图记。

四、八旗制度编设伊犁厄鲁特营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由于伊犁厄鲁特营生齿日繁,官差增多,原有官员已不敷差事。于是,伊犁将军阿桂奏称:

“移驻伊犁之索伦、锡伯、察哈尔,按新厄鲁特之例,编设牛录,故不论旗份,曾以近二百户为一牛录,每部各设六牛录。今生齿日繁,一切差使等项而又烦冗,如仍旧责成六牛录官员管理,实属不足。再两翼厄鲁特中,右翼人众,且陆续来归之厄鲁特,较前亦多。将此只责成六牛录官员管束,则亦不足。明瑞朝觐时奏厄鲁特足够增添二牛录,奉旨准行。因而,除照办外,锡伯、索伦、察哈尔等三部,亦同厄鲁特部,请增添二牛录,俱整编为八牛录,以为八旗。右翼厄鲁特增添两牛录,以左翼为上三旗,右翼为下五旗。又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牛录,既已各为八旗,其旗纛颜色,亦应按旗授之。”^③

遂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奉旨准行。同时,按照此次整编重新颁发了总管关防、佐领图记和八旗旗纛。

五、小 结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清廷对厄鲁特人采取招抚与安置政策。于是,伊犁参赞大臣阿桂考

①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移居伊犁达什达瓦厄鲁特分编旗佐设官管理折》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7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②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移居伊犁达什达瓦厄鲁特分编旗佐设官管理折》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7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

③ 《伊犁将军阿桂奏伊犁各营增添牛录并颁发旗纛折》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8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9页。

考虑到边境安全局势,提出编设伊犁厄鲁特牛录的方案,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其方案内容涉及屯田、孳生牲畜、官员拣选、官职、俸禄、钱粮、社会组织等诸多方面。此后清廷以该方案为蓝图,逐步完成了伊犁厄鲁特营的建制,并一直延续到清末。同时,察哈尔营、索伦营、锡伯营也以厄鲁特营为蓝本组建,且构成伊犁驻防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廷在设立伊犁将军之前按照伊犁参赞大臣阿桂的伊犁厄鲁特牛录方案将伊犁厄鲁特编设为6个牛录,但没有颁发图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设立伊犁将军府,明瑞任首任伊犁将军。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明瑞对阿桂编设的伊犁厄鲁特牛录方案进行调整,将伊犁厄鲁特6个牛录设置为一个昂吉,补放总管、副总管、佐领,并颁发了关防图记。这标志着伊犁厄鲁特营正式设置。虽后续因编设左右翼厄鲁特二昂吉及八旗牛录时更换过两次关防图记,但反映了伊犁厄鲁特营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总的来说,伊犁厄鲁特营的设置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止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历时11年,逐渐发展完善为伊犁驻防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厄鲁特营在之后长达150余年里,在军政合一的八旗组织下,担负着巡防、驻守卡伦、换防边境、牧放牲畜、开垦屯田等使命,为巩固祖国统一、抵御外侮、维护当地社会稳定和发展、增强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务力量,以及促进当地农牧业生产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邢文娟]

Beijing in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seventh year of Qianlong, in the name of pilgrimages, actually requested Qianlong Emperor permission to go to Tibet to boil tea. Although Emperor Qianlong showed a tolerant attitude and granted the request of Jungar under the pleas of Choinamka and the others, in view of the lesson that the Jungar envoys had returned for no reason before, he was very careful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number, time and route of the envoys to go into Tibet to boil tea, and took adequate measures to deal with it.

The Process of the Mongolian Princes' Withdrawal from Mongol-Goryeo Interaction: Reconsideration of the Death of Zhuguyu MA Hairuo(041)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death of Zhuguyu, a Mongolian ambassador, in 1224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Mongolian Khan Ögedei's attack on Goryeo in 1231. But materials show that there were other reasons for Mongolian expedition. Zhuguyu is the envoy of Genghis Khan's brother, Otchigin. The princes represented by Otchigin had once negotiated with Koryeo in parallel with the Mongolian Great Khan. After 1231, the power of the left wing princes gradually withdrew from Mongol-Goryeo interaction, and up to the time of Kublai Khan, the Mongolian Khan completely controlled Mongol-Goryeo interactio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and the Qing Dynasty's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 Yingkaer Bahezuli(056)

Qing Dynasty actively took advantage of Mongolian language with its standing and function to become highly important tool of communicat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unifying Xinjiang and building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 The role of Mongolian language in communicating Qing and Central Asia, presents the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of Qing dynasty with surrounding peoples. This essay is to make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edict of Qing emperors to the Central Asian rulers, and discuss the role of the Mongolian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ruling Xinjiang and managing the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

Character Portrayal of County Officials in Qusibei Inscriptions in Yuan Dynasty GAO Baoyu(065)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qusibei inscriptions was county-level officials, and its content mostly praises the poli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ruling activities of county-level officials. The use of qusibei inscription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ounty-level officials in the Yuan Dynasty.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qusibei inscriptions not only portrayed county-level officials, but also served as a process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monument. Shaping the image of official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value of qusibei inscriptions in the local society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it is also a cultural choice of nomadic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Ölet Battalion in Ili in Qing Dynasty Khasaghai Buyanbatu(072)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Xinjiang, Qing Court made up a defense system to strengthen northwest defense. The Ölet Battalion in Ili was a component of the Xinjiang Garrison Eight Bann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Ölet Battalion began in the 25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60) and finished in the 36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71). Over a period of eleven years, the Ölet Battalion in Ili established the organization of Niru (or Sum), composed the Anggi, finally divided the left and right wings of the Anggi, and in the end established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During this process, it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took shape, changing its emblem three times.

On Sheng Shicai's Ruling Policy to Mongols in Xinjiang..... GUO Ruipeng(078)

Jin Shuren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ethnic discrimination, which led him to withdraw from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Xinjiang only five years after he was in power (July of 1928 to April of 1933). In view of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his predecessor, Sheng Shicai implemented six major policies, namely, anti imperialism, pro Soviet, equality, peace, honesty, and constructio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Tianshan Mountain gradually became stable, and Mongols also ushered in a short spring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political position, Sheng Shicai gradually lifted the veil of democracy, followed the anti Communist, anti Soviet and anti people line, and pursued the policy of ethnic oppression. Mongols has fallen into a state of living in dire condition. On the whole, Sheng Shicai's local regime implemented a policy of ethnic oppression in disguise of democracy against Mongols in Xinjiang. Through this article, we should not only see the dawn of modernization of Mongols in Xinjiang during this period, but also see the real face of Sheng Shicai as reactionary.

The Image of the China's Northern Borderland in Foreign Image Documents

..... **LIU Chunzi(088)**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region by outsiders is based on their ow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perspectives. When observing the culture of China's northern region and culture, they focus on practical purposes while also trying to avoid the influence of stereotypes. The values of respecting faith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China's northern borderland have deeply influenced outsiders who are deep in the cultural circl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wars and exhibitions, the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was either actively or passively spread to the Eurasian 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 zone.

Localiz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Hulunbuir Region and Frontier Society

..... **CHEN Huawei(093)**

Hulunbuir Grassland was not only a beautiful pasture for Mongolian people, but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Mongolian cultur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brought Tibetan Buddhism to Hulun Buir with the migration of Ölet, Khalkha, Buryat Mongols and Khorchin and Durbert Mongols. Tibetan Buddhism gradually localized in Hulunbuir in the struggle with shamanism and coexistence of other religious beliefs, and actively adapted to the status of Hulunbuir environment and folk customs to form a distinctive temple building. After the Zhaomiao Temple was established, it maintained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merchants economically, which made the temple fair centered on Zhaomiao Temple have the sig-